

第一輯

李石岑講演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SHIH-TSEN LEE'S
LECTURES
FIRST SERIES

李
石
岑
講
演
集

第
壹
輯

商
務
印
書
館
印
行

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 代序

稚暉先生：我與先生相識，是在民國九年同到湖南講演的那一遭。一見面，便知先生是個有特識的人；後來相處稍久，并知先生是個有獨行的人。那時我心目中，有兩個人認為是我國青年的模範：一個是先生，一個是蔡子民先生。先生的不坐轎，不乘人力車，不赴宴會，和子民先生的不喝酒，不喫烟，不事徵逐，猶屬餘事；而先生一團勇猛的精神，和子民先生一副誠懇的面目，直無時不可以激發青年的內心，實在令我不能不生十二分的敬仰！先生最近拿着鄉下老頭兒靠在柴積上晒日黃說閑空的態度，發揮了「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」的一篇大文章，我讀了固屬佩服先生的卓識，尤其佩服先生那種童稚未鑿的天真和精進不懈的努力。先生雖不以學問家自居，却是個極留心學問的人；并且先生的那種留心學問，是無所爲而爲的。我友梁漱冥先生亦復和先生同樣的留心學問，但他是爲着生活不安而往前尋求的，他的學問和他的生活是處處有個較量的；這層先生也曾經說

過。他這種態度，自然不由得我們不特加敬禮；但爲生活而學問，究竟學問不能使我們生活安全，却還是一個問題。不過由愚見看來，學問固多少可以影響我們的生活，但我們豫先立定一個主意，必求生活解決於學問，不特勢有所不能，抑且理有所不可。因爲生活是主觀的，學問是客觀的，生活是偏於意志的，學問是偏於知識的；欲求主觀解決於客觀，意志聽命於知識，又焉可能？但學問雖不能全部的解決生活，却很可以局部的整理生活，或使生活漸進於豐富。漱冥先生如果必欲由學問全部的解決生活，那我却不保證他能夠解決得了；所以有少數人推測他或者將來要重行回到佛家的路子，或者竟蹈他尊翁的覆轍以至於自殺。（這種推測，先生也向我表示過。）如果僅欲由學問局部的整理生活，或使生活漸進於豐富，那是漱冥先生不僅資格獨備，而且已經得了不少的後繼者；因爲他對於生活異常認真，他的生活能夠跟着他的思想見解走，所以他的朋友因此也多受他的感化。總之，漱冥先生的爲生活而學問，雖與先生無所爲而爲的有別，却比那些爲功利而學問的高出一籌。爲功利而學問，可說是一般人的普通現象，尤其是在我國目下的

學術界。這種現象的流弊，足以暗示青年熱中功利，把學問當作一塊敲門磚；功利到手，學問便可不要；設使又有一種功利可以企圖，那時學問之念又起；結果，學問完全做了功利的一種手段。這在功利本身，雖說得計；但就學問說，可就吃虧不少了。至少我以爲有下列的幾個弊端：一，熱中功利的人，他必定另有一個目標；他所費的努力，必順着目標求取得一點代價，而且要快快的取得；因此學問就不免要受一種大大的委屈，而冒牌的出品，也就藉此獲得一些銷路。二，這種出品，有時銷路轉暢，其結果足以阻礙真貨的輸出，而顧客的受害益深。三，這種人多販賣零貨，他雖成本不大，却各樣貨色都有，顧客爲貪圖便宜，也樂與交易，其結果使各種大企業無人去幹。這幾項情形，在我國現前學術界，實在不能爲諱。學問遇着這種厄運，怎能有進步可望？但這是就極淺薄的功利派而言；嚴格的說，還配不上功利。真正爲功利而學問的人，他的主眼別有所在，他背後必有一種確定的主義。所謂功利，大抵是就大多數說；無論爲一小團體或一大團體，現在或未來，都包括大多數而言。爲功利而學問，無異說爲大多數的功利而學問，想藉學問來解決最大多

數的幸福與安寧。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，究竟能由學問解決與否，姑且不論；但學問本身已因謀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之故，不能不多少由一種本然性而趨於一種可動性。因為甲團體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，不必同於乙團體；現在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，又不必同於未來；那麼，學問在甲團體認為正確的，不能保證在乙團體亦認為正確，在現在認為正確的，不能保證在未來亦認為正確；則學問雖以普遍妥當為其特質，到此亦不免失其根據。我們既已提到學問，當然以求正確或求正確之最大限度為鵠，而彼為功利而學問的人，不僅未暇及此，而且常被發見一個不易彌補的缺憾，就是他們好以部分概全體，以效用概實質。所以他們的發意雖可嘉許，但結果對於學問上的貢獻却是很少。由此推論，以學問為出發點，而批評治學態度之是非得失，當然不歸到為學問而學問一條路上去。因為為學問而學問，其主旨只在學問的闡明，而牠非所問。所以學問的效果如何，或是一時得不到效果，或竟永遠得不到效果，在為學問而學問的人看來，都是不足掛意的。他們把學問看做進化的路程中人類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發現，所以用不着功利的

辯護。他們對於學問的看法，和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的看法，恰好相反。爲功利而學問的人大抵看重現前的實用，以爲學問的價值就可由牠實用的範圍廣狹而定；數學能夠計算，能夠測量，所以數學是有價值的學問；電學能夠造電車、電信，所以電學是有價值的學問。但在爲學問而學問的人，觀點便完全不同；他們把學問和學問的實用看作一件東西的兩面。他們只探求學問的究竟，換句話說，他們只探求真理的究竟。他們不爲計算測量而研究數學，如果能探求得數學的究竟，即非歐幾里幾何學或虛數等，亦不能稍減他研究的興味；他們不爲電車電信而研究電學，如果能探求得電學的究竟，即電子的構造或以太的實性等，亦不能稍挫他探求的勇氣。因爲數學的價值正不必表現於計算測量，電學的價值正不必表現於電車電信；牠們的價值永在探求的途中，愈探求而價值愈顯著，一面發揮自身之實際的價值，一面組成自身之理論的體系。牛頓看見蘋果落下而想到地球的引力，但他決沒預想到今日物理學上的應用；愛因斯坦（Einstein）懷疑牛頓之引力法則而想到質點的引力可使空間和時間生歪斜（Distortion），但他決沒預想到未來以

太學上的應用；法雷德 (Faraday) 在一八二五年發見石油精 (Benzin)，九年後密傑爾立希 (Mitscherlich) 發見從石油精酸的採取法，這兩個著名的化學者當從事發見之時，并沒預想到這種無色可燃性的液體，將來可以號召幾百萬的職工；一八五三年湯姆遜 (Thomson) 在哲學雜誌上發表一篇電波振動的理論，也決沒預想到這篇文章裏面就立了現在各種無線電信的基礎。總之，他們只管組成學問自身之理論的體系，而學問之實際的價值，却決不因他們沒預想到而不呈現。因為他們的背後正有不少的發明者。發明者與發見者的事業雖有不同，而他們的價值高低，却未易強生區別；發明界的偉人安迪遜 (Edison)，正不必比相對性原理發見者愛因斯坦價值增高。由此可知學問的究竟之探求，自別具有一種價值；不存求些許價值的念頭，而獲得絕大價值的結果，這便是為學問而學問所得的報酬。為學問而學問的人，既不存價值的念頭，所以雖由學問發生一些良效果，他也不願居功；反轉來說，如果由學問而發生一些惡效果，他當然也不願居罪。飛行機雖是成了戰時空中的利器，但這不能怪到想出紙鳶的原理的阿爾基達士 (Archytas)，潛

航艇雖是成了戰時水中的利器，但這不能怪到想出比重的原理的阿爾基麥德士 (Archimedes)；毒瓦斯雖負有戰時一霎間殺害千百萬生命的兇威，但這不能怪到發見瓦斯的穆爾脫克 (Murdoch)；德意志敢與列強反目，釀成歐洲的空前大戰，但這不能怪到倡權力意志的尼采 (Nietzsche)。可見學問和學問的實用，絕對不能併爲一談。所以爲學問而學問的人對於學問的看法，和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的看法，恰成一個對向。合上述三者而論，無論其爲生活而學問，爲功利而學問，或爲學問而學問，都各有其立腳點，即各有以表明其治學的態度。但治學的態度之不同，骨子裏就由於做人的態度之不同；所以爲生活而學問的不得不有爲生活而學問的一種生活，爲功利而學問的不得不有爲功利而學問的一種生活，爲學問而學問的不得不有爲學問而學問的一種生活。這幾種生活，那種合理，那種不合理，這是不能由個人的見地批評的。由愚見看來，無論那種生活，都有其生活上的特徵，并且各種生活都是互相調劑，不可缺少的，尤其是應該產生多種樣式的生活，那生活纔能日進於豐富。生活和人生本一而二，二而一；由人生態度可以看出生活態度，由

生活態度，也就可以看出人生態度；由人生態度之不能統一，就可以想見生活態度之不能統一。爲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，是想處處由學問使生活得着安全。凡一舉手一投足，一飲一食，一哭一笑，都要叫牠得着安慰。凡物質上的不滿足，精神上的不愉快，都要叫牠轉變方向，使結果仍可以得着一個滿足，得着一種愉快。我們只要順着生命的本來方向做去，便可以無入而不自得，便舉手也好，投足也好，飲也好，食也好，哭也好，笑也好；因爲要笑的時候不笑，要哭的時候不哭，便是逆着生命的方向而行，而這副要哭要笑的情感便不能發抒。所以情感催發我們笑時，只管盡量的笑出來；情感催發我們哭時，只管盡量的哭出來；哭的時候，看似痛苦，實則要哭時不哭，哭時而不能暢快的哭，乃真痛苦。飲食也是如此。飲食只須順着生命的要求便可隱消百病；凡過量飲食或飲食不足，都是有逆於生命的本來方向。其他一舉手一投足，無不如此。物質上感着不滿足，精神上感着不愉快，都緣於不向生命去找尋而求取於外；一向外取求，便萌貪念；既萌貪念，則一切社會上的紛亂，便都從此始。

梁漱冥先生的人生態度，恐怕是這樣。因爲他留神考察個人生活不

安的所在與夫近代人生活的墮落，所以想提出孔家哲學來作一時的救濟。這是他爲生活而學問的一種生活。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，幾幾乎全部都是描寫他這種生活態度的。我友朱謙之先生，也多少和這種態度相似，所以從前爲懷疑一切而著虛無哲學，現在却轉向信仰，而發表他的周易哲學了。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，是想處處由學問使大多數得着幸福與安寧。大多數是他的一個大我，他自己不過是大我中的小我；小我的一切是非善惡無不影響於大我，大我的一切盛衰榮辱亦無不影響於小我；但小我是死亡的，大我是永存的；大我是有人格的，小我是附着大我才發生人格的；因此，我們不能不勉爲大我中的一個善良因子。這種人無論對於科學和藝術，都是用這個見地去評價。脫爾斯泰像是抱這個見地的人，他在人生論上，就處處發表他這種態度。他拿磨坊裏面的水車作比喻，說水車的目的在產出良粉，人生的目的在探求人類的運命和幸福；如果忘却這一點，那便任何學問都無用處。但現代所謂科學家，每每把水車的目的忘却，專門去研究那水流的方向，這不是很愚蠢的事嗎？因此，他的藝術觀和科學觀，都開闢一

個新局面。他最初罵倒一切偽藝術偽科學，因而自己下了真藝術真科學的一個定義，他說：「人們如果要想到甚麼是他們的運命和幸福，那麼，科學便是這種運命和幸福的教師，藝術乃是這種教訓的表白。」蘇羅門 (Solomon) 和孔子的法則是科學，摩西 (Moses) 和基督的教訓是科學，雅典的宮殿，大維德 (David) 的詩篇和教會的禮拜是藝術。」他最後舉出真藝術真科學應具有的兩種特質：一，從事科學和藝術的人，是不在爲自己的利益，而在由犧牲自己去實現那科學和藝術的使命，這是內的特質；二，凡一切製作，要使一切人能理解，這是外的特質。由脫爾斯泰的藝術觀和科學觀與夫他所舉的兩種特質，便完全知道他那種人生態度，便完全知道他是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；因此，他的生活態度，也另具一種色彩。他的最濃厚的色彩，像無抵抗主義的生活態度，何嘗不是由他那種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而來。最後論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。這種人生是完全以探求自然界的真理爲依歸的。真理究竟有無其物，真理是否可以進化，他都不問，他只是向前面去探求。他認爲在進化路程中人類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發現者，必可

以多少找尋着幾許痕迹。這一點一點的痕迹，雖不因我們不找尋而不存在；但不找尋的結果，也許誤認到別種痕迹；因為別種痕迹又有別種痕迹的來路，別種痕迹的找尋又要另作一次的探險。然他雖出於找尋，却等於不找尋。因為他不是本來沒有的，再向別的地方去找尋；他是本來就有的，只是不知安放何所，而出於找尋；並且他所以找尋不是為自己的利益，也不是為他人的利益，結果并無利益可說，只不過把自然界的本來面目揭出而已。所以他的科學觀和藝術觀，另是一副樣式，出於「知自然」的態度者為科學，出於「樂自然」的態度者為藝術。他既只和自然相接近，他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一分子，所以他的趣味和享樂，不必向社會去找尋，也就可以免去一切實生活上的煩悶。王爾德(Wilde)為一極端的唯美主義者；他認唯美的享樂為人生最高的目的；美的價值，絲毫不含功利的分子；價值愈高，則其排功利的色彩亦愈濃。王爾德欲宣傳他這種唯美主義，曾於千八百八一年獨往美洲，力斥美國人的生活為非美術的；雖遭失敗，而他的唯美主張仍不稍懈；其後又不幸觸某侯爵之忌而至於入獄，但他的唯美思想仍堅持到底。可知他這種生活態

度，完全由那種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而來。此外像蘇格拉底爲逢人便盤問人生真義而被判處死刑，哥白尼爲說明天體運行而見嫉於教會，加里略 (Galileo) 之死於地動說，布爾諾 (Bruno) 之死於汎神論，何莫非這種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。由是可知一個人的生活態度，處處根據於他的人生態度；人生態度未能統一，生活態度當然也不能統一；所以批評那種生活合理，那種生活不合理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不過由上面三個人生態度看來，爲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，似乎仍脫不了功利的色彩；因爲他雖是注重在生活，但仍集中於人事，結果似和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無大區別。關於這點，我往時在「藝術論」上曾經討論過，我以爲功利有二義：前者爲第一義的功利，後者爲第二義的功利。第二義的功利，專着眼在社會的善，是一種外的生活；像美學上的美善同體說，譬如說操練爲舞蹈的目的，標識爲雕刻的目的，乃至勸善懲惡爲詩歌的目的，都是這一派的主張。若第一義的功利便不然，他的主眼全在表現生命的根本活力，找出生命的本來方向，是一種內的生活；像美學上的遊戲說，謂人類生活力有剩餘時即溢而爲遊戲，這種遊戲和美

根本相通，所以說美爲生的剩餘。但第一義的功利，若稍不加意，即墮而爲宗教問題的脫爾斯泰，社會問題的左拉 (Zola)，道德問題的易卜生 (Ibsen)，所以爲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，最容易誤會到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。但爲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，却也有和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相交通之處。因爲爲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，主眼在表現生命的根本活力，找出生命的本來方向；而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，也正爲此。不過他的精神擴大些，他不僅想表現人類生命的根本活力，不僅想找出人類生命的本來方向，他直有「宇宙內事」已分內事，乃「宇宙內事」的氣概，所以他的人生態度，又另是一番氣象。於是我們由這種推論的結果，可以劃出幾種生活而得次表：

爲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	——	求個人的真	——	個人生活
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	——	求社會的善	——	社會生活
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	——	求宇宙的美	——	宇宙生活
爲生活而學問的人	——	有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色彩	——	因爲他著手在個人，而着眼却

在人類全體；爲功利而學問的人，有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色彩，因爲他着手無論在國家在社會，但着眼總在大多數的最大幸福，爲學問而學問的人，有個人主義和藝術的精神，因爲他着手雖出於個人的興趣，着眼却在藝術的全體。法國人的風度似看重爲生活而學問，英美兩國人的風度似看重爲功利而學問，德國人的風度似看重爲學問而學問。然風度雖有這種差別，却是根據於個人的好尚者其力弱，根據於社會上歷史上的暗示者其力強，所以當前次歐洲大戰爭最劇烈的時候，各國愛真理的哲學者文學者乃至科學者，莫不爲己國辯護，而集矢於他國；如哈普特曼 (Hauptmann) 倭伊鏗 赫克爾 柏格森 梅特林克 坦努爵 (D'Annunzio) 一流人，莫不由崇高的講座上的哲學者，寂靜的書齋裏的文學者，豐富的試驗室裏的科學者一變而爲街頭的政論家，社會的批評家，國家的志士；都把他們所懷抱的真理一切忘却。羅素看了這種情形，氣憤不過，於是在一九一五年發表他戰時的正義一種論文，痛論當時各國的哲學者文學者乃至科學者的態度的不對，以爲我們看到己國的是也宜看到敵國的是，我們攻擊敵國的非也當攻擊己國的非，因在論文中